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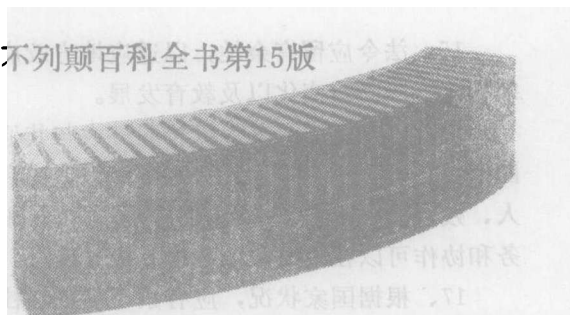


图 书 馆 (一)

王培章 耿济安 译校

历史的回顾

图书馆这个用语,在英语里指的是为阅读、研究和参考目的而收集的一批书(它来自拉丁语的Liber,“书”),自从它出现在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塞(Geoffrey Chaucer)1374年翻译的罗马哲学家包伊夏斯(Boethius)的《哲学之安慰》(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译文中,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在法语(以及其他罗马语系的语言)中,并不都具有相同的意思,有的用来代表书店,有的加以引伸其意,用来代表出版社;其他许多国家用来表示公共的或私人的藏书一词是来自拉丁化的希腊语bibliotheca一词:在法语里是bibliothèque,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语里是biblioteca,在德语里是Bibliothek,在俄语里是biblioteka,在日语里,这个词是tosho-shitsu。把Library一词用来表示藏有图书的一个建筑物,一间房或一套房间的图书馆也有很长的历史,它可追溯到十五世纪。

所有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通过收集来保存一切资料。但是它们也用作其他的许多目的。它们现在收藏的资料常常包括缩微胶卷、幻灯片、照片、磁带以及图书和手稿。这样,由于拥有易于得到的情报和把情报传递给学者或其他人的便利手段,而又由于能向各种年龄的社会公众提供指导性的、启发性的阅读、观察、聆听的资料,因此图书馆在现代社会机构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文章从最早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开始论述,并说明不同类型图书馆的职能;概论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原则;最后,对技术时代图书馆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作出说明。

古代世界 远古时代,记录(或档案)室和图书馆二者没有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图书馆的存在几乎有着像保存记录那样长的历史。在古巴比伦的尼普尔(Nippur)城的一座庙里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上半叶充满泥版文书的许多房间,说明当时就有收藏丰富的档案和图书。在埃及的阿玛尔那(Tell el-Amarna)也发现了公元前二千年同样的亚述泥版文书集。亚述最后一个国王艾休尔·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627)保存了约两万五千个书板的档案,是从全国的庙宇里系统地收集来的抄本和正本,大部分已署上了他的名字,有的表明国王进行了编辑,并且使它们都集中在他的尼尼微(Nineveh)宫殿里。

希腊和亚历山大收集图书的思想,以及后来人们所熟悉的图书馆,起源于古典时代。甚至在很早的时期,大多数希腊庙宇似乎都拥有图书馆。有许多庙宇无疑还收藏档案。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是有名的私人藏书家,但是第一个重要的学院图书馆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与许多大的哲学流派出现在雅典(Athens)。斯多噶(Stoics)学派的人没有财产,没有图书馆,柏拉图(Plato)学派和享乐主义者伊壁鸠鲁(Epicureans)学派则有图书馆,其影响达许多世纪。但是最有名的是逍遥派的藏书,它是由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建立起来的,并由他予以系统的组织,以便利于进行科学研究。后来,亚里斯多德图书馆传给了他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此后为特奥斯(Teos)的阿佩利孔(Apelleicon)

所拥有。公元前84年,索拉(Sulla)征服了雅典,亚里斯多德图书馆的藏书被作为战利品从阿佩利孔手中夺过来,带回到罗马,罗马的大嗜书家、演说家西塞罗(Cicero)非常高兴地得以享用这批图书。

公元前一世纪后期的旅游者和历史学家斯特雷波(Strabo)说,亚里斯多德图书馆构成建立古代最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典范。亚历山大图书馆是由托勒密一世索特(Ptolemy I Soter 死于公元前283年)设计,而由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菲莱德夫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308—246年)与他的顾问法利兰的得梅托里奥斯(Demetrius)的合作下建成的。这个图书馆的建立者显然期望收集全部希腊文献最好的有用本子,系统地序列,以便成为出版注疏的基础。它收藏的草纸和皮纸卷轴据说达数十万。座落在茅琛(Mouseion)的女神庙里,由许多有名的希腊作家、学者充任管理员,其中包括语言学家和诗人卡利玛科斯(Callimachus,死于公元前240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死于公元前194年)、拜占庭(Byzantium)的哲学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死于公元前180年)和古代第一流的批评家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死于公元前145年)。

别迦摩 Pergamum 在小亚细亚,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死于公元前197年)和欧墨涅斯二世(Eumenes II,死于公元前159年)统治时代建立了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的图书馆。据说羊皮纸就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以对抗托勒密·菲莱德夫斯禁止从埃及出口草纸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妨碍了为其图书馆抄写图书。整个别迦摩王国的全部图书在公元前133年传给了罗马人民,蒲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了一个传说:安东尼(Antony)把它的二十万卷图书给了克利奥佩特拉(Cleopatra),成为亚历山大图

书馆的一部分。

罗马 在古罗马有许多私人图书馆,包括西塞罗的图书馆。从提倡德育的政治家塞尼加(Seneca)的严厉批评和诗人卢西恩(Lucian)对未受教育的“图书小丑”(book clown)的深恶讥笑来推测,的确私人拥有图书馆变得很流行。罗马和赫尔库拉内(Herculaneum)的发掘已揭示出,在私人住宅里无疑地有图书室。在赫尔库拉内的一所住宅里,墙的四周安有书架。一位罗马政治家兼将军卢加拉斯(Lucullus)成为古代世界人所共知的最富的人,以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出名。在战争中他所得战利品的一部分是大量的图书,这些图书,他慷慨地提供给有兴趣的人们使用。他的传记作者普鲁塔克多次赞赏他的藏书质量,西塞罗谈过这样一个插曲,当他来到这个图书馆要借一本书的时候,发现他的朋友加图(Cato)置身于斯多噶学派的书籍之中。

凯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年)计划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委托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也是一篇有关图书馆问题的论著(De bibliothecis,此书已失传)的作者马卡斯·德伦西·瓦尔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死于公元前27年)执行他的计划。在计划实现以前,凯撒就死了。但是一座公共图书馆却由文学赞助人阿西尼厄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死于公元4年)于五年之内建成了。蒲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在他的博物学一书里面描述这个图书馆的建立,并创立了一句名言:他使人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共同所有(ingenia hominum rem publicam fecit)。这句名言一般都用之于图书馆。台比留(Tiberius,公元前42—37年),维斯佩基安(Vespasian,公元9—79年),图雷真(Trajan)和后来许多其他皇帝也都建立一些图书馆。由图雷真在公元约一世纪所建立的乌尔匹阿(Ulpia)图书馆

一直延续到五世纪，这个图书馆也是罗马官方的公共档案局。

康斯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于公元四世纪在拜占庭建立的帝国图书馆是基督教的文献中心；而且在保存希腊和罗马文献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受到野蛮的日耳曼人的入侵而灭亡，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遭到火焚或任其毁灭。然而，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断简零篇却在基督教教堂里和修道院里被保存下来了，从这些残篇中后来才开放出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花朵。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 修道院的作用早在公元二世纪，随着修道院团体的建立，发现图书对于精神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有几个修道院的规则中包括了使用图书的有关条例。特别是 Benedictine 的规则，认识到了阅读和研究的重要性，提到“图书馆”和在牧师的监督下对图书馆的利用，牧师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出图书，并且每年对图书进行检查。手稿室 (Scriptoria) ——抄写手稿的地方——又是修道院的共同特点。特别是 Benedictine 规则的有关条例中把抄写手稿作为保存手稿的严格责任。许多人——意大利的蒙蒂·卡西纳 (Monte Cassino, 529年) 和博比奥 (Bobbio, 614年)；法国的吕克昂 (Luxeuil, 550年)；德国的赖克纳 (Reichenau, 724年)，富尔达 (Fulda, 744年) 和科维 (Corvey, 822年)，英国的坎特伯里 (Canterbury, 597年)，韦尔穆斯 (Wearmouth, 674年) 和贾罗 (Jarrow, 681年)——都因抄写手稿本而闻名。使用图书的规则制定出来了，而偷走图书的人则招致了咒骂。然而，图书被还是借给了其他的修道院，甚至不顾安全借给其他非宗教界的世俗民众 (修道院以外的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修道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这些修道院图书馆所藏的内容，主要包

括圣经经文、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著作和关于它们的注释、编年史、历史，例如比得 (Bede) 的英国教士圣·托马斯·阿奎那斯 (St. Thomas Aquinas) 和罗杰·培根 (Roger Bacon) 的哲学著作，可能还有些罗马诗人弗吉尔 (Virgil) 和贺瑞斯 (Horace) 及演说家西塞罗为代表的世俗文学。十三世纪大学建立以后，回到修道院的僧侣学生们，在一些图书馆中存放了他们关于记录的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以及法律和医学等演讲的笔记，这样就扩大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内容。

新知识 (The new learning) 新建立的大学图书馆连同修道院图书馆，直到中世纪后期，一直是研究学问的重要中心。图书都很昂贵，除了少数富人以外，是一切普通人无法能购买的。然而十三、十四世纪，甚至十五世纪，却看到私人藏书的发展。法国勃艮地的公爵菲力普·古德 (Philip the Good)，路易九世 (Louis IX) 和查理五世 (Charles V，他可能就是现代称作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奠基者) 都是大的藏书家，还有像达拉谟教区 (Durham) 主教利查德·伯里 (Richard de Bury) 这样的红衣主教也是藏书家，他写过一本赞扬图书的书：Philobiblon，1473年在科伦第一次印刷出版。但是新的文化因素——包括商业的发展，文艺复兴的新的学问 (以新发现的古典文本为基础)，印刷术的发明，世俗人民阅读能力的大发展——藏书家的范围扩大到富裕的商人方面，他们的图书馆藏有法律、医学、草药、正规的祈祷书和其他的祈祷文献。意大利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如彼脱拉克 (Petrarch) 为建立他们的学术图书馆寻找和抄录古典著作的手写本。尼可罗 (Niccolò Niccoli)，是美第奇 (Cosimo de Medici)* 的图书馆馆长，一个很富有的佛罗伦萨艺术的资助人，和 Gian Francesco Poggio Bracciolini 是两位继承了彼脱拉克的热情的学者，他们踏遍欧洲和近东来搜寻希腊和罗马作家的手稿。

也从意大利以外搜集了可观的图书（虽然佛罗伦萨仍然是繁荣的图书贸易中心），如：法国亨利二世（Henry II）的情妇 Diane de Poitiers、法国的高级官员和外交家，图书装订者的顾主（Jean Grolier）、乌斯特伯爵（Worcester John Tiptoft）、英格兰的亨利七世（Henry VII）和亨利八世（Henry VIII）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藏书。

彼脱拉克曾希望把他的藏书遗赠给威尼斯市作为公共的图书，然而他的这个想法没有能够实现。但是，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尼可罗的图书馆基础上，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San Marco）女修道院建立了 Marciana 图书馆。Cosimo 的孙子，学术和艺术更大的赞助者——洛伦索（Lorenzo）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成了公共图书馆。它于1571年开放，馆址是由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设计的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物，至今仍然以 Laurenziana 图书馆**为名而保存（虽然1808年它与 the Marciana 合并成为 Medici-Laurenziane 图书馆）。其他许多壮观的图书馆也在这时候形成，包括匈牙利的 Matthias 一世 Corvinus 的图书馆。像美第奇的图书馆一样，Corvinus 派人到利万特（Levant）去购买手抄本，而他也是有名的佛罗伦萨手稿批发商 Vespasiano de Bisticci 的顾客。Corvinus 图书馆在1526年土耳其占领其首都布达（Buda）时遭到破坏。

（残存的少数图书现在保存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国立图书馆里）。1557年在马德里建成的厄斯科利阿尔（Escorial）图书馆是以菲力普二世的藏书为基础的。梵蒂冈（Vatican）图书馆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它的现今藏书的真正奠基者是教皇尼古拉斯五世，他曾派人到德国、英国和希腊去搜寻手抄本；西克斯廷四世（Sixtus IV, 1471—1484年在位）把这些图书重新集中在梵蒂冈图书馆现在的馆舍里。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影响 英国的修道院图书馆于1536—1540年告终，这时候，

寺院被亨利八世查禁，他们的珍藏都被分散了。没有采取有组织的步骤来保存他们的图书馆；似乎是有很少的几个——然而对于整个来说只占很小的比例——作为皇家图书馆了。1550年又一次发生了更大的毁灭：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与人文主义者的“新文化”结为联盟；大学、教堂和学校图书馆藏有中世纪“旧文化”的图书均被取缔。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统治时期，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时当权人士认识到，已被分散了的各种图书对政府政策的宣传将会是有用的；坎特布里（Canterbury）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和女王的秘书长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带头寻找和搜集已失散的手稿。其他许多收藏家，如罗伯特·布鲁斯·科顿（Sir Robert Bruce Cotton）和汤姆·波德利（Sir Thomas Bodley）也积极参加。结果在宗教查禁时已散失了的大部分图书到1660年被重新汇集起来——帕克收集来的归到剑桥的基督教学院，科顿收集的收在英国博物馆里，波德利收集的构成了牛津大学波德利图书馆——这些图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在欧洲其他地方，宗教改革时期也发生了许多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被毁的情形，特别是在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然而宗教改革的领导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却深信图书馆的价值，1524年他在给全体德国城镇人民的信中坚决主张，不论是辛劳或是金钱都应当用于建立图书馆或图书室，特别是在较大的城镇里。结果，德国许多城镇图书馆，包括汉堡图书馆（Hamburg 1529年）和奥格斯堡图书馆（Augsburg 1537年）都起始于这个时期。这些图书馆和新近创立的大学图书馆（如Königsberg、Jena和Marburg）至少一部分是在老的修道院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样地，在丹麦，来自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都合并到新的大学图书馆里去了，尽管有许多图书遭到了破坏。

德国的图书馆在三十年战争中严重地遭到浩劫,例如1386年建立的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帕拉提纳(Palatina)图书馆的图书被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作为战利品抢走,1623年他把图书送给格雷戈里十五(Gregory xv);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把全部图书送到瑞典,其中多数图书扩大了1620年建立的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由于在克里斯蒂纳(Christina, 1626—1689,瑞典女王,在位时期1632—1654)和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于1824—1830为法国国王)统治时期落于瑞典人手里的战利品(图书)而大大丰富了它的藏书。

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由于天主教信仰未曾动摇,旧的图书馆仍然存在,由耶稣会为教育的目的而增加了一些新的图书馆。

十七、十八世纪大的国立图书馆 十七、十八世纪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收集图书的广泛热情,有时是出于摆饰,但往往是出于真正治学的结果。有几个很好的私家藏书都被集合起来了,其中许多实际上成了今天大的国立和州立图书馆中心——因为这也是全欧洲出现新的国立和大学图书馆的时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发展。在英国,建立了许多教区图书馆,附属于教堂,主要供牧师、神父、神职人员之用。〔最早的一个是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的格兰瑟姆(Grantham),早在1598年就建立起来了,而且原来的一些加了锁链的图书,现在仍然在那里可以看到。〕有的图书是由世俗人赠送的:曼彻斯特富商汉弗莱·切特姆(Humphrey Chetham)于1653年捐赠钱款建立了波尔顿(Bolton)和曼彻斯特教区图书馆和曼彻斯特市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依然存在,收藏在原先建筑物中的原来的书橱里)。后来,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还有欧洲其他地方)

很流行流通图书馆和收费图书馆——图书俱乐部,该俱乐部向它们的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参考服务工作和外借图书,在形成群众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爱好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图书馆设计 法国有势力的和有影响的藏书家,如红衣主教马赞林(Cardinal Mazarin)的私人图书馆非常之大,以致图书馆的组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1584年在马德里建立的Escorial图书馆,第一次使图书离开了中世纪间隔的模式,而把图书排列在沿着墙壁放的架子里面。旧的把图书用链条连在书架上的作法逐渐被抛弃了,而改变成现在的竖式排列、书脊向外的办法首先从法国作起,可能从历史学家雅克·奥古斯特(Jacques—Auguste de Thou,死于1617年)的图书馆开始。马赞林的图书馆是由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 Naudé)主管的,他创作了第一篇论述图书馆管理学的近代专著“关于创办图书馆的建议”(Advis Pour dresser une Bibliothèque, 1627年)。这一著作对王权复兴时期的藏书家和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著作广泛地被翻译,它标志了向近代图书馆管理时代的过渡。首批成果之一是日记作者塞缪尔(Samuel Pepys)精心照料和保存的优美的图书馆仍然在剑桥的马格达莱纳(Magdalene)学院。诺德(Naudés)的学术图书馆的概念——系统地排列展示整个记录下来的知识对所有学者开放——已经确立。尤其是它为哲学家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图书馆管理者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死于1716年)所吸收,他设想了一个全国目录组织,能为学者提供容易查阅有关他的学科的一切著作。他意识到,科学的进步,最主要的是依赖学者之间自由地交流,而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要提供和开辟这种交流的渠道。

国立图书馆的出现 知识的范围在十

七、十八世纪迅速地扩大，特别是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造成大量图书的产生，膨胀了个人收藏家的图书馆。律师、历史学家、国家顾问雅克·奥古斯丁(Jacques—Auguste de Thou)主管皇家图书馆(du Roi图书馆)

(查理五世建立，十五世纪被路易十二大规模地加以重新组织)。马赞林在所谓投石党(Fronde)运动期间，当他被迫离开法国的时候，他的图书分散了，但是1661年当他恢复权力的时候，又重新收集起来，再一次收藏在一所新的建筑物里，1691年对公众开放，一直是法国的大图书馆之一，直到法国革命以后，与其他的图书馆(包括皇家图书馆)，合并成为国家图书馆，现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1604年布伦兹维克公爵(Brunswick)奥古斯丁(August)建立了一所图书馆，后来成为沃尔劳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赫佐格·奥古斯丁(Herzog August)图书馆，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莱布尼茨(Leibniz)从1690——1716年是它的图书馆馆长〕。由佛兰德堡选举人弗里德利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组织起来的图书馆成立于1659年，后来成为普鲁士邦图书馆。英国图书收藏家汉斯·斯隆(Sir Hans Sloane)、罗伯特·科顿、爱德华和牛津的伯爵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等人的藏书成了不列颠博物馆藏书的基础。不列颠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它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国家图书馆；1757年由于加进了皇家图书馆，包括从爱德华四世(1442—1483)到乔治二世(1683—1760)的英国国王所收集的图书而进一步地扩大了。

法国革命的影响 从欧洲大陆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反教会运动，使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遭到关闭的命运：例如，在法国1789年没收了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德国在1803年、西班牙在1835年都发生了类似事件。但是，这些图书的分散工作要比亨利八世时(1491—1547)英国修道院的图书分散工作

组织得较好。在法国，这些分散的图书收集在大城市的所谓文献库里；1792年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贵族家庭的藏书上，这些遗散图书也增加到文献库里。这些图书的大量累积产生了很多问题，许多图书被丢失了，但是实现了协调全国图书资源的计划。国家图书馆接受了大约三十万册图书；新的图书馆在许多重要省的城市里建立起来了。拿破仑(Napoleon)在欧洲的胜利战役也以战利品的形式给国立图书馆增添了新书，但是结果这些收集来的图书只是暂时的，大部分图书在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后都被送回去了。在德国，150多个被没收的图书馆的藏书使巴伐利亚邦图书馆大大地丰富了。许多其他省立图书馆也同样地增长了。在奥地利，没收图书馆的结果，在林茨·克拉根富(Linz Klagenfurt)和萨尔茨堡(Salzburg)建立了研究图书馆，格拉茨(Graz)和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大学图书馆大大扩大了，维也纳的霍夫图书馆(Hofbibliothek)增添了许多贵重的新图书。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十九世纪发生了一种意义重大的觉醒。图书馆在规模上已经有了增长，但是它们的成长却是很偶然的；管理工作显得很薄弱，服务标准几乎不存在，采购(图书的)经费不充分，图书馆馆员的岗位被看作是业余时间的事，编目工作拖拉并且缺乏适当的方法。哥丁根(Göttingen)的大学图书馆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第一任图书馆馆长约翰·格斯纳(Johann Gesner)与该大学的评议员G.A.Von 芒奇豪森(G.A.Von Münchhausen)密切合作，根据莱布尼茨(Leibniz)定下的原则，极力包括各门学科；这个图书馆提供了良好的经过仔细选择的文献目录，而且尽可能为所有的人自由利用。下一任的馆长海伊纳(C.G.Heyne)热心地遵循了同一原则，因而，哥丁根图书馆成为当时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图书馆。

到这个世纪中叶,学术图书馆的范围和目标的新概念已在各处形成。在短短几年之内,图书馆服务的图景已经改观了,在这个发展中重要人物是安东尼奥·帕尼兹(Antonio Panizzi,后来成为安东尼爵士),是从意大利来的政治避难者,他于1831年开始为大英博物馆工作,并且在1856—66年作了该博物馆的馆长。从一开始,他就改革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说明图书馆里的藏书应该符合它宣称的目的,并指出这些目的在大的国家图书馆中应该是些什么。他觉察到良好目录的重要性,因而他为编目员精心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编目规则。他也看到了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作为一切人可以利用的学习和研究工具的潜力,并且通过他对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与之相伴随的书库的计划来说明如何才能使这种潜力实现。他的这些思想在学术图书馆——即现在所谓的研究图书馆界中一直到现在还处于支配地位。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到目前可能已经实现了这些思想的主要表现。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图书馆可以由地方当局用公共经费来建立的思想已经为大家所接受。这证明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已达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帕尼兹曾表示,他希望一个大的图书馆的设备要能为贫苦学生所使用,以便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于是,在1850年,英国通过了一个议院法案,授权地方议会为准备免费图书馆的设备征税。从首次试验开始,在提供阅读服务上和大众利用阅读服务方面都有持续不断的生长。这时,图书馆不仅提供图书和期刊,而且还提供有很多视听资料;有时还提供演讲、戏剧演出、艺术展览的条件,甚至还可以把艺术作品借回家去用。公共图书馆像这样的发展,在联合王国、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是最普遍的。在欧洲别的地方,大的城镇图书馆被看作是公共图书馆;而且,自十八世纪以来,地方图书馆和一些阅读小组在某种程

度上还提供了是大众教育性的读物。但是一直还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活力和可望的社会精神。

二十世纪图书馆服务增加了新的广度和新的范围。科学和工业研究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规模的专门情报的出版物——大部分是期刊形式——的大量增加,导致了要求迅速地容易地查索广泛的期刊文献,和提供关于专题的参考和书目资料的情报服务工作。特别是在应用科学方面,书不再被看作是知识的主要贮存所;现有的研究图书馆,有相当多的备用藏书,但相对地却缺乏现代的科学期刊,以传统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惯例,一般来说,不能满足新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看来是落后的,而与现代的需要脱节。结果导致了专业图书馆的发展。这些专业图书馆往往与商业性企业或专业团体有关系,并由他们提供经费。这种图书馆对研究图书馆现在所提供的那种服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公共图书馆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图书馆的种类

世界上各国图书馆的现行业务,在细节上国与国之间变化很大,以致只能讲述它们最一般的活动情形。尽管这样,它们多少年来都遵循着逐渐形成了一种粗略的可以辨别的格局。

国立图书馆 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或邦立图书馆,或由国家资源所维持的图书馆群。它们往往承担出版全国目录和保持全国目录资料中心的责任。国家图书馆主要是致力于收集和保存本国的文献,虽然它们力图在藏书方面尽可能达到国际的范围。

多数国家图书馆,根据法定权利接受一本本国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呈送本。世界上某些其他图书馆也分享这种特权,不过它们中间许多图书馆只是根据其本身的需要才接收法定(或版权)的贮藏本。

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都是西方世界最有名的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图书馆。它们的重要性,来自它们藏书的质量、藏书的规模和藏书的范围;藏书范围是全面的,并且努力保持它的全面性。但它所取得成功逐步减少,因为世界上每日出现的出版物数量的大量增加,以及难以保证有足够代表发展中国家所发行的出版物。

法国国家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大革命之前叫做皇家图书馆(du Roi),它起源于查理五世,在15—16世纪时期,它是接受许多成批的重要手稿的图书馆。1617年,在大收藏家J·A·得图(de Thou)的管理下,重新肯定了它的法定贮藏权利,并且继续严格地执行。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里成立了图书馆的四个部(版本部、钱币部、印本书部、手稿部);1735年对社会公众开放。由于法国的大革命和没收贵族、教堂的私有藏书,其结果增添了这个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在莱奥波德·得利尔(Léopold Delisle, 1874—1905)的管理下,完成了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并在1897年着手编辑书本式印刷目录,这个目录现在仍未齐全(1971年出版了209卷)。这个图书馆藏有六百五十万册印本书,十八万卷手稿,五百多万册其它出版物。

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 不列颠博物馆是唯一的把一个故物的博物馆与一个综合性的大图书馆结合起来。它是在1753年由接受乔治二世的医生、皇家学会会长汉斯·斯隆(Sir Hans Sloane)遗赠的收藏品而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是在两个其他重要藏书,即罗伯特·哈顿(Robert Contton)的藏书和牛津伯爵爱德华(Edward)和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的藏书的基础上建立的,1757年又增加了乔治二世所给予的皇家图书馆,与这批藏书一道也有了贮藏不列颠诸岛出版的每种书的一本的法定权利;这种

法定权利被最严格地执行着。这四种基本藏书,在这个图书馆历史的第一世纪,通过补进许多私人藏书而显著地扩大了。这些私人藏书,包括乔治三世(1823年)的藏书和托马斯·格伦威尔(Sir Thomas Grenville, 1846年)的藏书。安东尼·帕尼兹(Sir Anthony Panizzi)如上所述的那样,重新组织了这个图书馆,使它具有现在的现代状态;在1880年至1905年期间,他还印刷了这个馆的目录;1961年到1966年以263卷的形式重新出版。像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那样,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在早期印本书和手稿的收藏方面异常的丰富,这些印本书和手稿中有许多是目录。它继续接受了贵重的书稿和印刷资料这样一些重要的藏书;它在乐谱和地图方面也有很好的藏书。藏书总计有八百五十万册印本书,十五万多卷手稿。图画和其它出版物收藏得也非常多,和钱币和奖章一样,都分别保存在这个博物馆的单独的部里。

美国国会图书馆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最大的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现代图书特别广泛。它建立于1800年,但是1814年美国国会大厦遭炮火轰击期间,图书遭受焚燬,损失很多。这些损失在以后不久由于购买了汤马斯·杰弗逊图书馆的藏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弥补。这个图书馆严格地作为国会图书馆有很多年,但是随着通过购买和版权法的规定而增加的图书,使藏书显著地扩大了,这个图书馆——事实上,虽然不是法律上——成为并且一直是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的目录卡片在1902年首次印刷出来,作为其他图书馆订购使用(在头一年有212个订户;现在有数千个美国图书馆和机构使用),这一服务工作是由1899年到1939年的图书馆馆长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开始的。1927年,这个图书馆开始印刷代表大约二千五百个图书馆藏书的全国联合目录,这个联合目录的纪录现在已经达到一千八百万种的惊人数字,而

且目前正在印成书本式联合目录。这个图书馆已经收藏了总数达一千五百万册图书和小册子,二千九百万件手稿,十七万六千种其它出版物和图画,三百万套照片底片和幻灯片。进一步服务于学术研究的还包括有出版几种专题目录。

列宁图书馆 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是苏联的国家图书馆实际是最近的产物。它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作为代替老的列宁格勒帝国图书馆而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它经常接受苏联出版的所有新出版物的副本,它的藏书据称有二千五百万册印本书和二百五十万件手稿。

其他国立图书馆 除了这四个大的国家图书馆以外,还有许多有着重要藏书和长久历史的其他国家图书馆。1837年在勃艮地公国(The dukes of Burgundg)图书馆基础上建立的布鲁塞尔阿伯特一世(Albert I, 1875年——1934年,比利时国王,在位期间1909——1934年。——译者)皇家图书馆是比利时的国家图书馆,是这个国家图书馆网的中心;它经常与许多大学图书馆和安特卫普的大的城镇图书馆保持着借阅业务。海牙的荷兰皇家图书馆是1798年建立的,它也是个发展很好的馆际互借系统的中心。意大利,由于它的历史发展是一系列的城市国家,它有许多国家图书馆,为首的是罗马市的(Vittorio Emanuele II)国家中心图书馆,建于1875年,拥有二百万册图书,还有佛罗伦斯市的历史上藏书更丰富的国家中央图书馆,建于1747年,拥有四百万册图书。其他的意大利国立图书馆是在米兰、那布勒斯、巴勒摩、杜林和威尼斯。德国在二次大战以前同样以邦立和省立图书馆的重要性以及缺少公认的国家图书馆而称著。原先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在1919年曾获准承担国立图书馆的任务。在二次大战之后,它以国立图书馆的名义,成为拥有藏书三百万册的东德的国家图书馆。西

德没有这样的国家图书馆,这样图书馆的职能是由法兰克福的德国图书馆和马尔堡(Marbury)和西柏林的普鲁士文化国立图书馆来履行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是由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在1493年建立的,它有丰富的藏书——以从奥地利修道院和(Matthias Corvinus)图书馆得来的手稿而称著,这些手稿在土耳其人1526年夺得了它的首都布达(Buda)之后散失了。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是1960年按照立法正式产生的,是比较新的产物。不过,它经过与联邦议会图书馆合作,为实现其作用作了长时期的准备。它负责编辑澳大利亚的国家书目,已建设起重要的藏书,并且在图书馆协作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968年以后,它在伯利格里芬(Burley Griffin)湖畔有了一座非常好的新馆舍。

亚洲至少有二十五个国家有国立图书馆,其中有些——包括北京图书馆,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国立和大学图书馆——拥有二百万册以上的图书。印度加尔各答的国立图书馆(原先的帝国图书馆),1903年建立,藏书一百多万册。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立图书馆:阿根廷的国立图书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的国立图书馆在墨西哥城,巴西的国立图书馆在里约热内卢,比较起来是最大的。非洲发展中国家,创立国立图书馆大部分仍然是一个梦想,虽然它们中许多通过提供国立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已经在向着实现国立图书馆的方向采取了非常有用的一步。

大学图书馆 象国立图书馆一样,大学图书馆总的来说范围是比较全面的。其中著名的有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和牛津的波德利图书馆,其藏书的质量和范围可与最大的国立图书馆相媲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它的藏书规模几乎象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那样大。自从1638年建立以来,经过连续几届著

名的图书馆馆长认真地建设它的藏书，现在在英语和外国文学、法律、经济、斯拉夫文献、东方学文献方面的藏书是很突出的。在馆长领导下，这个图书馆有将近一百名专家和独立的系图书馆。波德利图书馆是靠汤玛斯·波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于1602年在原先的一个图书馆的馆址上建立起来的。汤玛斯·波德利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和书籍爱好者。他能够吸收许多对图书馆的捐赠，而且很成功地与伦敦的出版公司（Stationers Company）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该公司按照要求把出版的每种新书的一本贮藏在这个图书馆里。这种特权，通过逐次的版权法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波德利图书馆现在正在重新组织下属图书馆联合会，其中包括赖德克利夫（Radcliffe）科学图书馆，印度学院图书馆，法律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

其他许多大学图书馆，特别在美国，有非常大量的综合性藏书，有些达三百万册，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芝加哥、洛杉矶和普林斯顿；它们多有非常好的特藏。属于东欧许多科学院的图书馆的情况大体相同，特别是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图书馆，该馆建立于1714年，1911年十月革命以后被大大地扩大了。

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它促进成年人、青少年和儿童阅读书籍，是提供日常的情报和参考的中心，在这个中心，现代公民可以获得关于实质问题的可靠的公正无私的指教，他还可以得到帮助，在现代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中确定自己应持的方向。

公共图书馆从十九世纪中叶不声不响地开始，现在馆藏丰富的参考图书馆和分馆系统为基础的广泛的借书工作，通过流动图书馆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外围地区的服务工作。公共图书馆为老人和残废者提供专门的设备，在许多情况下，专门组织为当地学

校、医院和监狱服务的图书馆业务。所提供的业务与市区和它所包含的地区的大小按比例各有不同。要是非常大的市区，图书馆提供的服务规模可能是相当大的，包括有参考书图书馆。这种图书馆具有大的研究图书馆的许多特点。例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具有许多研究领域的丰富藏书；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是美国第一个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并且第一个直接由公共税收资助），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既作为学术研究，又作为一般阅读这样两重性的图书馆。在英国，首先由税收资助的一些公共图书馆是1850年建立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它们提供了这个国家总的国立图书馆服务的很重要的部分。公共图书馆活动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已经由立法所承认；立法规定了保证所有的人免费利用图书馆。

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建设了具有地方特点的藏书，经常提供当地工商业的情报。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多地提供乐谱、唱片资料，并可借回家里去。在某些国家——特别是瑞典和英国——可交押金，把艺术品原件借回到家里使用。

不是所有国家所提供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设施都有同样高的标准，但是到处都有了一个趋势，认识到这种服务设施价值的趋势，对已有的服务设施进行改进，而没有这种服务设施的就开始采用引进。为了这种服务工作的的发展，公共图书馆馆员，通过象国际图书馆联合会这样的组织，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专业图书馆 上面所述的国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体系的支柱，照顾着学者和一般公众的需要。这些图书馆由满足高度专业性和商业团体的需要而建立的图书馆加以补充。这些专业性图书馆是感觉到在科学和工业上需要比传统式的图书馆有可能对目录情报更好地控制，更有效地传递和利用而发展起来

的。专业图书馆在一个国家有计划的图书馆体系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论是直接的，如美国的国立医学图书馆和农业部图书馆，或间接的，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国立科学和发明参考图书馆，还有大的参考图书馆的其他部分（例如，国立图书馆的地图和音乐图书馆，或如哈佛大学和波德利全部图书馆中的专门图书馆）。专科学院和专科大学的图书馆自然它本身就是专业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经常附属于官方机构，如政府各部、医院、博物馆等等。但是，它们多半是为满足工业和商业组织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严格地按照实际需要来计划它的活动，并仔细地控制它藏书的规模和范围，虽然它们的活动也许或经常是很大而且很广泛的。它们广泛地与其他图书馆进行合作。它们大部分致力向专门读者传递情报，以响应或预先考虑他们的需要。因此，专业图书馆多致力于情报技术的理论研究，包括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它们的活动导致对图书馆业务实践的批评性而重新估价，因而极大地有益于改进图书馆的一般工作。

学校图书馆 在一些存在有公共图书馆立法的国家，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往往为学校图书馆所利用。技术手续，如采购和加工由当地图书馆执行，然后送到学校，放到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去。例如，在丹麦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这样密切的合作，如德国、瑞典和英国。在美国，这种服务和商业编目服务工作相似；在苏联，是通过全苏图书联合会来进行的。该组织提供文献著录，并分发到这个国家所有的学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重要性，被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广泛地接受；教师很少有时间来适当地管理图书馆，因此，委托专职的职业图书馆馆员越来越普遍了。

私立图书馆 私人拥有的图书馆的兴趣

范围正和它们的收藏者个人的兴趣范围一样各有不同，因此，它们不适合一般化的论述。私人图书馆这个用语无论如何是不幸的，因为它给人的概念是这样的图书馆没有社会的重要性。私人藏书家经常能够深入地收集关于某个主题方面的图书，其程度通常是一般公共机构所不可能达到的；书商和其他收藏家了解他，及早向他提供有关他感兴趣、适合他收藏的图书情报；他能够密切地注意他所买书的情况。他以这些方法极大地增加书目的总和知识（特别是如果他自己的藏书为学者所用的话）。

例如，亨利·克莱·福尔杰（Henry Clay Folger）收集了一种书的不少于七十种本子——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次统一版本。（1932年，他在华盛顿开了一个福尔杰（Folger）莎士比亚图书馆，这里为存放他的藏书而建的。由于他收集图书的无限制的性质，结果他极大地增加了关于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和十七世纪印刷的知识。

（未完待续）

- Medici, de', Cosimo I. chief of Florentine Rep. (1389-1434) 佛罗伦萨共和国元首
- Medici, de', Lorenzo I. The Magnificent. Prince of Florence, poet, scholar & Patron of art & Literature (1449-1492) 佛罗伦萨亲王、诗人、学者、艺术和文学的赞助者
- Medici, de', Cosimo I. Ist. grand duke of Tuscany (1519-1574) 托斯卡纳(意大利)大公爵
- 据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 •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

1981年本刊连续发表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图书馆学”条目译文全文，该条目较详细地论述了图书馆的管理和工作程序，颇受读者欢迎。

今年，本刊将继续刊出它的“图书馆”条目译文全文，以便读者对该书有关图书馆条目的全貌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图书馆”条主要从最早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开始论述，并说明不同类型图书馆的职能；概略地论述了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原则；最后，对技术时代图书馆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作了说明。译文发表时由文新秋同志作了较大的校改并加注。

——编者